

（二〇一八年一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书刊评论】	“革命名份诱惑”的历史注解	王国伟
【抗拒遗忘】	北京八中老三届反思文革记事	黄 坚
【亡灵祭坛】	我的母亲李敬仪	吴晓晴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书刊评论】

“革命名份诱惑”的历史注解

• 王国伟 •

20多年前，李逊女士曾跟我说起，她在研究“文革”中的上海工人运动，我没在意。20世纪90年代，她去了美国，还是为了这个研究项目。21世纪初，她返回了上海，继续为这个项目在奔波，但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已经从上海“文革”工运史拓展为整个上海“文革”运动史了。今天，刚出版的100多万字的新书《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下简称“史稿”），就搁在了我的案头。当面对耗费了作者20多年美好光阴、凭借作者的信念和乐在其中的坚持而完成的书稿，不得不让我肃然起敬。

细读这部书稿，字里行间的纷繁、离奇、诡异、荒唐……那个年代所有的人生乱象，向着我们蜂拥而来。对我们这些“文革”亲历者而言，就像一幅大型历史风景画和动态全景画，它带着强大的历史张力，缓缓展开。同时，书稿又像一个平静的叙述者，故事中充满着细节和活的生命形态，记忆、经验连同感情一起被惊醒。

作为一部重要的断代专史，其历史使命显然不仅是满足当代亲历者们的阅读，更重要的是要给未来的读者和研究者们留下历史。未来的读者，他们将在远离当代的时空中，从字里行间读出事实的真相，这才是本书最大的意义和价值。

为了确保真实或者说更接近真实，作者长达20多年的历史书写过程，不外乎就是当事人访谈、寻找阅读各类历史资料、伏案写作三种方式，三种形式都极其枯燥乏味，其行为过程绝对称得上是一种高级别的行为艺术。而这种坚持本身就是一种态度，有学术的、有人生意义的。因此，我不想仅用职业眼光和学术价值标准来研读此书，我更愿意把书与人之间那种机缘和命运之间的默契作为本文写作的基点，当然，还是一贯的写实。

一、让历史活过来，是撰史的一种境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我们眼下的当代史都是“农转非”和“臆想性写史”。虚构或观念先行，成就的史书也一定是利于撰史人或活着的人的历史。脱离了历史现场，又不愿花时间和精力去挖掘现场、还原现场，这是当代史学界的通病。而这样的历史只能是冷历史，因为它缺乏生命温度和学术真诚的点化。

因此，让历史活过来，是撰史的一种境界。而活过来的前提是接近真实，还原历史细节。通达这种境界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认真的态度和踏实的历史寻踪，脚踏实地在历史资料中爬梳，其过程十分艰难。无论你是田野调查还是徜徉于故纸堆，艰难如同修炼。所以学界有一种说法，历史书写是成本最高，成效最低的学术劳动。有时可以为一个细节、一句话的考证，花去你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尤其是当代史的写作，文字资料匮乏，许多信息和材料缺乏足够时间和学术沉淀，所以，查询资料、去伪存真，更需要一手田野调查和反复甄别。

20世纪的中国，曾有过不少优秀的学者，通过深入扎实的农村田野调查做出来的学术成果，至今还有生命力。如梁漱溟30年代山东乡村实验，陈翰生带着薛暮桥和孙冶方做的农村调查，费孝通《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他们都是深入现场，零距离的调查才做出严谨的学术判断，因此，这些著作的学术坐标意义至今尚存。尤其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在战火纷飞的20世纪30年代，在十分简陋的交通通信条件下，艰难走遍大半个中国，实地考察分析中国历史建筑及其地理和文化环境，写出《中国建筑史》已近80年了，其留下的历史建筑图像和著作的经典意义，至今无出其右者。

显然，做史态度决定立意高度。《史稿》作者，不但有着不同于上述前辈学人的工作难度，而且，因为是当代史撰写，大量资料阅读、辨识、甄别就是首要工作。落定的官方档案至今未解密，只能以散落在民间的资料为主。

虽然“文革”时期，传播介质比较单一，但还是生产出非常多的信息资料。作者面对的是海量的传单、大字报、学习资料、批判材料，还包括公告、文件等半官方材料，还有各类组织的文件和内部资料。资料来源越来越多，不断发现也就意味着不断否定之否定，需要十分认真阅读、比对、核实、甄别。这种阅读和核实的过程，工作强度非常大，绝对是重体力+重脑力复合劳动，经常为一个刚反复求证并形成的事实判断高兴不久，就被新发现的材料而否决，这种心神俱疲感，有时真让人崩溃。

其次，作者基本遍读“文革”结束近40年来，一些领导人陆续出版的回忆录、传记；各类关于“文革”的研究著作和资料类读物；还包括已经出版或半公开的回忆资料和“文革”中官方公开的各类文件。这些书稿和资料的撰稿人、办刊人都有各自的立场和角度，甚至有很复杂的情感因素，因此，多重角度释放的大量信息，错综复杂，需要核实比对。但这些材料同上述生产于“文革”中的资料形成很强的互补性，原始资料加上理性回忆，对形成书稿的基本框架，和关键性细节的核实起了关键性作用。

二、深入访谈“文革”当事人——一条更加艰难的取证和印证的道路

对这类固化的文字资料予以活化，不但需要仔细阅读和分析这些历史资料，更需要通过经验和感受的通道，来回看历史。在还原历史真实的过程中，作者依然受困于资料的单一所带来的思维片面性。为了进一步求证，作者选择了另一条更加艰难的取证和印证的道路——深入访谈“文革”当事人。显然，这个过程更加艰难。作者没跟我说过访谈当事人的具体过程和心理状态，但作者的多次当事人约谈过程，我是亲眼所见。

当事人访谈方式，曾有学者做过，但《史稿》作者所规划的当事人访谈数量和访谈内容非常广泛。事实上，实际完成深入访谈约120多人，访谈过的人次约数百人次，有的人需要多次访谈。全部访谈记录整理之后，都给被访谈人仔细确认。这项工作不算上后期整理，即是前期预约、访谈过程，工作强度就非常大，绝对是耗时、耗力、耗精神。而且作者坚持直接访谈，就给访谈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文革”当事人身份状态各异，身体状况不一，有的当事人身体状况很差甚至病重。大部分当事人都在“文革”中出尽风头，他们或者是造反骨干先锋，或者是“文革”文胆，无论是使用鞭子还是笔杆子，都做过错事或坏事，“文革”后要么被处分，甚至被判刑。其中当然也有“文革”中的受害者。这些访谈对象群体的复合型特征，造成了这个群体心理状态复杂多变，他们大部分人生状态低迷，内疚、悔恨、甚至愤怒等等，组合成一个基本的心理状况。不愿再回首那段经历，是大部分访谈对象的普遍心态。

因此，突破当事人的内心障碍是第一个难题。而要突破访谈对象的心理壁垒，首先作者自己的心态和心理必须健康和强大，因为，一个心理访谈者首先必须是访谈对象的情绪垃圾筒。访谈者自身心理状态，决定吸纳和消化信息的能力，这种方式的撰史做法，作者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做好访谈前的功课和必要的知识资料准备外，更需要意志和心理的充实。同时，面对被访谈人，需要热情、耐心和真诚。从作者为本书坚持了多年访谈经历来看，平等与理解的访谈姿态十分重要，就容易获得访谈对象的信任，能顺利进入话题。

预约当事人是访谈的第一步，预约有时意外的顺利，有时被断然拒绝，过程充满戏剧性。需要用十分仔细和理解的态度预约，还要预设访谈话题，不断的交流和不厌其烦，才能获得当事人的理解和信任。对一些重要的事件或为了一个细节的核实，有时需要多次反复访谈，才能廓清。有的当事人“文革”后受到法律惩处，不再愿意重揭疮疤，宁可把过去带进坟墓。所以这种访谈针对不同的访谈对象、或者不同的情绪下，该选择什么方式预约、访谈，都体现一种艺术性。

访谈原则必须是平等和畅所欲言，访谈的基础是真诚而不带先入为主的偏见。今天，不少当事人已经作古，作者长达多年的访谈，也为我们抢救了一段重要的口述历史资料，在《史稿》成书之外，形成了另一个特殊的史料价值。

三、革命名分的诱惑

《史稿》面对的是长达10年“文革”史，而作为“文革”重镇，上海有着特殊的地位。而《史稿》准确地锁定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和上海“市革会”写作组，这两个上海“文革”造反运动中的典型对象。从现象上看，北京红卫兵运动是“文革”的缘起，反体制、破制度是红卫兵运动的直接后果。但红卫兵运动高潮只持续了近两年，大部分学生就上山下乡被放逐了。

而差不多时间兴起的上海工人造反组织，才是“文革”的主力军。上海工人运动和上海“市革会”写作组，是贯穿上海整个“文革”史、影响全国的两个典型符号。如何驾驭这样大的历史题材，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这需要整合纷繁的线索，梳理出清晰的写作脉络，叙事展开要有逻辑，与事实要形成准确对应，还要符合基本的学理规范。作者在《史稿》写作中，创造性地发现并提出了“革命名分”的概念，继而发展成一个完整的可扩展的叙述句式：“革命名分的诱惑”，这不但准确而又有说服力地落实了写作的逻辑起点，也顺利地形成书稿主体脉络。

显然，作者提出的“革命名分”概念对应的是“经济名分”概念。经济名分不但是全世界有史以来的社会群体分层的基本依据。“经济名分”的阶级认定标准是财产占有量，其中包括两个辨量：一个是财产可量化；另一个就是财产类型可分解。“经济名分”的历史合理性在于，它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它充分体现了社会、历史、意识的逻辑性进步。这样一种名分，其稳定的基础是依靠法律的对合法财产的保护，以及超越不同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的社会、文化趋同的社会基本伦理道德的支撑。虽然对财产及其来源的合法性解释，各个历史阶段、各种社会制度会有不同的设定，但基本都认可并维护这种经济名分。这种整体性社会评价力量不但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也是对人类天性的一种保护。

而“革命名分”概念，一般都是在社会特定时期被某种政治力量使用的一种工具。相对经济名分的理性操作模式，革命名分基本采取暴力模式，包括思想暴力、语言暴力、身体暴力等整体性暴力操作，才能推动这种非理性的社会分层的基本实现。大动乱、大革命、大变动，一定与现存体制和制度结构形成对抗。打破现存制度的前提，就是打破制度的社会基础，即以经济名分为标准形成的阶级分层。而打破不是目的，而是为建立一个取代现存制度的新的制度。革命名分通过暴力方式，快速地重置了上中下层的社会结构，形成了地富反坏右等下层阶级分层、这种非理性的阶级分层，成为被普遍认可的严重社会后果。

“文革”初期，区别于北京红卫兵运动，上海工人运动开始也短暂体现民间性质，但很快就被组织性特征所替代。上海作为“文革”实践的重地，尽管其间有武斗等乱象，但从开始真正的大规模发动到最后被整体收编，经过的是动员——失控——再动员的过程，民间群氓力量始终得到来自上层的明示或暗示，都体现了行政动员的运作特征。当实现了这种收编之后的上海“文革”，已经有了与革命名分对称的新的政治社会制度。因此，短暂的身体暴力后面，跟着的就是在革命名分旗号下的，长期的思想暴力、语言暴力，随着这种暴力的不断落地，也就铸定了每个人的命运归宿。

这种所谓的“革命名分”概念的形成，其实已经持续发酵了几十年。49年后的社会，经历过各类运动的清洗，已基本消灭并重构了经济财富概念，只是到了“文革”期间，发展到概念荒唐性实践的顶点。但这种逆历史潮流的社会阶级分层一直处在十分尴尬之中。当脱离整个世界价值伦理轨道后，就需要设计一个新的政治伦理，赋予“文革”行为的正当性。“革命名分”就是这种历史过程发酵的必然结果。

上海“市革会”写作组，其早期源头是在“文革”之前，从样板戏的策划和操作到批海瑞罢官，写作组的早期政治思想霸权症候已经形成。“文革”中，区别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实行身体暴力，作为上海工人运动形式变体的写作组，基本是思想暴力和语言暴力的执行者。其主要功能是通过理论的御用转换，为“革命名分”提供历史和现实的“合法性”。这也是国家层面的行政性动员机制和控制机制形成的思想基础，从政治学上或社会基本伦理上，建构一种能产生全民性认同的价值观，实现人们和社会从抵抗到拥护的意识反转。

因为“文革”期间，在“革命名分”概念下，人的身份是被指称的，随意、主观和粗糙的任意指称，这就给任何手握这种权力的人，有了泄私愤、报私仇的各种机会。而社会群体本身隐含两个含义，一个是具体的人，一个是抽象的人。“革命名分”只能非常牵强地解释抽象的人，就如阿伦特所言，“是行政性结构性行为，进而构成了整体性犯错的条件、环境和气氛”。而抽象的观念和意识，在作用于一个个具体的人、事件和行为时，就必定是十分离奇和荒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和语言暴力对人的伤害是深层伤害，其伤害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思想文化运动。所以，《史稿》作者对上海“市革会”写作组予以大笔墨叙事的意义也在于此。

同样，相对于经济名分的长期性实践，“革命名分”的荒诞和不稳定性，也就注定了这种模式的短期性。今天，作为国家层面的整体的观念反拨，需要民族性意识反思。《史稿》正是通过本书，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该如何从感情思维迈向理性思维，并形成社会的整体理性意志和自控能力。

作者曾跟我说，《史稿》是努力追随史记的书写风格。作为一部当代史，用冷静笔法，作者犹如讲故事，叙事语言文学化，历史就变得十分感性。从《史记》到《万历十五年》，任何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无不都是这种叙事方式？感性叙事中，隐含观点和判断；建章立意，尤其是标题方式，也就从故事中自然提取，呈水到渠成的自然呈现。

《史稿》有十分合理的谋篇布局，章节标题取舍和每章之后的小结，充分体现了作者精心和设计，以读者阅读的方便进入作为写作价值标杆的态度值得史学界的借鉴。语言朴实反而显示严谨和诚恳，作者保持了最大的克制，不做过多的装饰性或者过于矫情的语言。因为，这种牵动万众读者神经和情绪的历史书写，本身就会遁入一种情绪失控的怪圈之中。因此，滥用情绪和过于矫情，都是历史书写的大忌。从这个意义上看，《史稿》是保持了一种历史专业主义的矜持和严谨，因为，感性叙事方式足以牵动读者阅读情绪，并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相应的亢奋和冲动。而这正是写作者的所追求的理想结果，其实也是作者和读者返璞归真的互动过程。

我们今天正处在社会转型的时代关口，当整个史学界基本都在回避这段历史时，李逊女士却做了一个史学家该做的事。而更该称道的是，这20多年的写作成书过程中，既没有我们眼下许多人追逐的所谓科研项目经费，也没有任何机构或单位资源的支持，只是凭借一己之力和心中那么一点理想，为我们留下了一部未来“文革”研究绕不过去的《史稿》。

□ 原载《爱思想》网

~~~~~

# 【抗拒遗忘】

## 北京八中老三届反思文革记事

• 黄 坚 •

〔作者的话：应某知名基金会的邀约，我撰写了“北京八中老三届反思文革记事”一文，以丰富该基金会文革史料的收藏和研究。在撰写过程中，我得到了八中老三届同学会陈小鲁会长的鼓励和具体指导。另外，文章中参考了陈小鲁编写和八中师生补充的《北京八中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修改稿）》中的内容。在此向陈小鲁等老同学和老师们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又一个“八一八”即将到来，值此将本文提供各位老同学老朋友，望不吝赐教和指正。

2013年8月18日，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的新浪博客发表了一组文革期间八中校领导被学生批斗的老照片。8月20日，该博客上又发表了同学会陈小鲁会长看到这些照片后的回复——即此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应的“陈小鲁文革道歉信”。为什么一个中学老三届群体向四十多年前挨批斗的校领导道歉会引起中国乃至世界多家媒体的关注和社会轰动呢？我作为文革时的八中1966届毕业生，现在的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秘书长及八中校友联络办公室工作人员，写下我的所知所想，也许有助于寻找答案。

## 一、文革初期北京八中的武斗状况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社论，第二天八中校园内出现了矛头直指校领导的大字报，不久一些学生发现一位校工经常卖血，不问缘由就揪斗了八中的校长、书记，并逼迫他们和个别有历史问题的老师进行“劳改”，同时发生了殴打他们的现象。不久工作组进入学校，控制了局面。七月底工作组撤离，成立了学生为主体的校文革筹备委员会，后来全校师生投票选出校文革委员会，陈小鲁是主任，十余名学校主要领导和个别历史有问题的老师被编入劳改队，限制人身自由，强制劳动，一些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开始变着法儿的整他们，如戴高帽，剃阴阳头等，殴打武斗现象也多起来。校文革委员会的成员是反对武斗的，但无法有效的制止打人。八月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对联传到八中，遭到许多同学的抵制，其中不少是干部子弟，包括陈小鲁本人，校内几次辩论，血统论的支持者并未占上风。但出身不好的师生仍感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有些还遭受到支持对联同学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支持造反。北京武斗之风愈演愈烈。八月十九日四、六、八中和北京教育系统造反派联合举行批斗北京教育系统走资派大会，会上发生严重武斗，八中校内打人现象再也难以控制，致使党支部书记华锦不堪忍受自杀，温寒江副校长遭批斗毒打，韩玖芳副书记被打致残。与此同时，北京掀起破四旧高潮，一些社会上的人也被抓到学校毒打至死，八中陷入一片茫然、混乱和恐惧的气氛中。后来文革斗争矛头转到中央，学生的注意力转到校外，加大串联开始，学校人少了，特别是华锦书记的死，给学生心理上造成巨大冲击，到8月底八中武斗之风渐渐消停，劳改队也解散了。

## 二、对八中文革武斗乱象的反思

中国有句古训：子不教，父之过。八中的武斗，乃至北京所有中学的武斗，究其原因还是教育出了问题，特别是社会和学校教育，因为在中学，社会和学校对学生的影响远远大于父母。在文革之前，社会和学校只宣扬个人崇拜和阶级斗争，缺少法律和人道主义教育。当毛主席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时，学生自然会将校长书记视为“阶级敌人”，并模仿《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记载的戴高帽游街的斗争方式。那时我们年轻，思想简单，行为冲动，凭感情用事，极易受极左口号和行为的蛊惑。

不过八中毕竟是北京市的重点学校，其良好的德育传统和人文精神仍根植学生心中，即使在最疯狂的八月，许多高年级同学，其中不少是干部子弟，还是保持了一分清醒，他们反对武斗，反对血统论对联，尽力保护了老师、同学和公共财产。其实，当时八中大多数的初、高中班级都没有发生批斗学生和老师的现象。

北京四、六、八中“批斗北京市教育系统走资派大会”出现的严重武斗和八中华锦书记的死，更加刺激和坚定了高年级同学要稳定秩序制止武斗的决心。8月25日，包括四、六、八中和师大女附中在内的西城各校联合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不管后来人们对“西纠”的评判和指责如何尖锐，但在当时公、检、法几乎瘫痪的情况下，“西纠”对稳定局势、缓解暴力确实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时隔五十年后，西纠组织者之一陈小鲁认为这是自己第一次用实际行动对文革进行的反思。他说，那年9月，他和六中董良翮带领五百“西纠”队员在北京火车站值勤一个月，保障了外地红卫兵来京见毛主席，而任务是周总理当面下达的。他反问，难道总理让我们去搞武斗吗？如果我们以武斗闻名，总理会点名让“西纠”去执勤吗？陈小鲁不否认“西纠”有些人搞武斗，但不能以偏盖全，哪个林子没几个坏鸟呢？后来又有几路造反派不搞武斗？！有的还动枪动炮嘛！八中高23班沈宁同学的外祖父是蒋介石的“文胆”、国民党高官陶希圣，但是当某校红卫兵上门抄家之时，恰逢也是“西纠”成员的杨树东等同学闻讯，立即冲进家中把那些红卫兵赶

走，还说以后再有人敢来抄家就通知他们。沈宁同学虽然家里最后还是被别校红卫兵多次抄家，母亲也被折磨致死，但是这一次“西纠”老同学的解救让他终身难忘。其实，当时的“西纠”不少成员还是有良知和“正义”感，对社会乱象非常反感，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

1968年开始，许多老三届同学或应征入伍或上山下乡，离开了学校，但没有忘记对文革的反思。我听到过不少同学向老师道歉的故事。如：文革中，八中刘国玮书记去某部队外调时，某同学就曾经对她表示自己对不起老师，诚恳道歉；文革后，初一有两个班的男同学为曾打过班主任耳光而当面向她们道过歉；初一某班女生因该班一位同学所谓“反对文革和毛主席”的不实之“罪”进行侮辱折磨导致精神失常，文革后她们一直在寻找其下落要向她集体道歉。一些伤害过老师的同学除了当面道歉，还邀请老师参加聚会活动、吃饭、旅游，表达自己的悔过和歉意，他们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和谅解。

文革结束后，1988年春，部分已回到北京的同学成立“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共推陈小鲁当会长，他拟定了同学会的宗旨“联络感情，交流志趣，互助互利，助教益民”，弥合文革造成同学间的隔阂也是我们组织同学会的想法之一。此后的二十多年，老三届的28个班联系到越来越多的同学，通过同学会和各班自己组织的活动加强了团结，增进了感情。

同学会成立后与母校和老师加强了联系，一些同学主动回校看望老师，学校和老师也尽力帮助校友解决实际问题。尽管“文革”中师生关系一度紧张，但绝不是所有的学生都与老师“冷眼相对”。在许多同学的聚会上，大家经常谈起八中老师的培养教育使个人的成长受益匪浅，以及校园生活中的种种趣事。

1990年的教师节，八中老三届同学会宣布，为支持母校的教育事业设立“奖励教师基金”，以鼓励那些对学校有突出贡献的老师。八中老三届多为工薪阶层，但为了体现对母校和老师的感恩与关心，他们除了支持“奖教金”的设立，还通过各种形式资助学校，二十多年来的捐款捐物累计早已超过百万元。这也可以说是老三届这代学生对当年教育过他们以及文革中受到过伤害的老师们的的一种道歉和弥补的形式。

### 三、八中老三届同学会文革道歉实录

2013年7月，八中老三届同学会决定组织一次与八中老教师的聚会，主题定为“感谢、道歉、祝福”。8月18日是“文革”标志性的日子，我在同学会博客上登载了一组文革初期八中校领导被学生批斗和劳改的照片，并在按语中说：“这是某同学保存的几张老照片，它们记录了1966年北京八中文革初期校领导（校长、书记、主任）被当做黑帮批斗和劳改时不堪回首的屈辱时刻。在同一时期，北京的各个中学每天都发生着这样的事情，而且千百位教师和校领导被残害致死。看到老师们斯文扫地，我们的心情是复杂的、是沉重的。虽然当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认为他们就是黑帮就该劳改就该挨揍，但是我们全都无可挽救的成为文革的坚决拥护者，甚而成为这场灾难的帮凶！中国历史上需要道歉的人很多，但是我们今天——一个历史上特殊的日子，可否从我做起，勇敢的向老师们说一声：对不起您了，我们真诚的道歉！”陈小鲁会长看到邮件深受触动，很快回复道：“感谢这位同学保存了这些珍贵的照片，感谢黄坚在8月18日将这些照片公布于众，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今天我想借网络向他们表达我真诚的道歉，八中老三届同学会正在安排一次与老校领导和老师的聚会，我希望能代表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的

老三届校友向他们郑重道歉，不知道校友们是否授权我做这样一个道歉？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为文革翻案的思潮，我认为如何解读文革是个人的自由，但是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否则谈不上人民幸福，民族富强和中国梦！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2013年8月30日和9月1日，陈小鲁和八中老三届的几位同学代表分别去当年挨学生批斗的几位年事已高的校领导家里探望、慰问，并且当面向他们道歉。文革中，陈小鲁虽然没有打过人，但是他认为自己当时是学生领袖，是校文革委员会负责人，没有能够制止住武斗，感到十分愧疚。陈小鲁说：“对于错误，人们往往有遗忘、回避、开脱和反思四种处理方式，而我选择反思道歉，只有反思道歉才能净化心灵，才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

10月7日上午，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的十几名校友与当年教过他们的部分老师欢聚一堂。陈小鲁感谢老师们给他代表老三届同学一个道歉的机会，他检讨了文革初期自己带头造反、批判校领导，组织批判北京市教育系统领导大会的错误，他认为“文革的根本问题是违宪，而消弭文革戾气，树立宪法权威刻不容缓！”在座的同学会理事计三猛同学是文革中最先带头贴大字报搞批判斗争的。他说今天小鲁代表大家向老师道歉，就是要还一个公道给老师们，要还一个真实的文化大革命给后人。他和同学们一起向老师们鞠躬表示歉意。

参与这几次活动的校领导以及老师们对陈小鲁和同学们勇于担当并作自我批评的精神非常赞赏，对学生们在当时大环境下做错事都能够谅解。他们还回忆起陈小鲁和许多同学在文革中对他们的保护。老师们还反省自己，学生犯错误老师也是有责任的；当年极力宣传阶级斗争，结果自食其果、深受其害，这些历史悲剧不能忘记，需要深刻反思。如果那时重视对学生的宪法教育、法治教育和人道主义教育，那么我们的许多错误就能避免，许多悲剧就不会发生。我们反思过去，就是要维护宪法的权威，实现今天的和谐，明天的更好！老师们的宽容、大度使在场的每一位同学都深受教育，倍受感动！看到老师愉快的神情，大家心中也都感到释然。

#### 四、八中老三届同学会道歉的意义

陈小鲁和八中老三届同学会文革道歉一时成为社会议论的热点是我没想到的。八中文革老照片和陈小鲁的邮件回复不胫而走，一时间反应强烈，国内外三十多家媒体竞相报道，原本是八中同学和老师内部的事情被炒作成“陈小鲁文革道歉”的事件，除了媒体人、知名学者的热议，网民的浏览量猛增十几万，各种肯定、支持、赞赏、反思以及反对、谩骂、讽刺、攻击接踵而至。这么大的社会反响必有其原因。

请看人们对“陈小鲁文革道歉”的评论和我们的解读吧：

“亲身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我们，知道小鲁是对那些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需要负责很少的人之一，但他对历史、对未来、对灵魂、对社会、对民族负责的精神，公开正式发出道歉，十分令人钦佩！”

“懂得忏悔的人才是有良知的人，敢于忏悔的人才是勇敢的人，支持我们的会长！”

经历八中文革的同学是最有发言权的，陈小鲁在邮件中写的很清楚，是代表同学公开正式地道歉，为八中文革画上句号。那些攻击道歉的人很可能没有文革经历或者忘掉了文革的灾难！



“感谢你！你已花甲之年，却做了一个伟大的榜样！面对道德良知缺失的年代，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像你一样，才能实现我们民族良心的救赎！”

“支持陈小鲁勇于担当的行为。中国需要这样的勇气。”

“道歉无论迟早，总是良心的闪光！是净化自己灵魂的必须，……。”

做错事要道歉是做人的起码道德和责任，我们做了应该做的事，却得到许多人不吝美辞的赞誉，因为道德和良知缺失的太久了。

“陈小鲁给推墙派利用了，还不自知，可悲可叹！”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文革道歉，做自我批评犯了哪条国法党规？如果不做自我批评，你那个墙别人不推也会倒，那时才真正可悲呐！

“文革是一份历史遗产，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正视它，审视它，但绝对不是全然肯定和一概否定那么简单。……文革发动的必然性也不是没有的，合理性也不是没有的。”

正因为文革是一份不简单历史遗产，所以采取遗忘、回避和封杀的态度是错误的。道歉是正视和审视文革遗产的正确方法之一。

“向陈小鲁致敬，小鲁同学言辞诚恳。作为文革的亲历者、老三届，深知那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有多么暴虐，有多么恐怖，有多么愚蠢，那是一场癫狂的法西斯运动，毁灭文明，毁灭民族精神，毁灭人性良知。对于一些试图给那个臭名昭著的文革翻案的逆流是当头一击。”

不错，文革道歉触及到一些人的痛处，才会有如此大的社会反响！

“文革——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文化和道德之沉沦，其责由时代和人民及发起者共负！我们的民族再经不起如此在根本上的折腾了！”

“关键是，一代本来安分善良的人们，为什么在当年会丧失理性，集体疯癫无法无天胡作非为，还自以为在从事正义事业，这个问题值得深入反思。如果人们还是不能头脑清醒，不会独立思考，不知敬畏法律，不知保护人权，不愿深化改革，还会浑浑噩噩，在种种思潮中陷入困惑，而国家难免重演文革再蹈覆辙。”

文革道歉正是为了不再折腾，不再重蹈覆辙。

“告诉后人文革的真相，反思文革是你们这些过来人的责任。”

文革道歉正是现身说法，尽文革亲历者的责任。

网友反馈很多，不能一一列举，总的说支持道歉者多于反对者，而沉默者是大多数。反对者中有一些人或没有亲历具体事件或没有真凭实据，他们的批评立场极端、言辞激烈、冷嘲热讽，在不明真相而对现实不满的人群中大有市场。由于当局对文革问题采取回避和封杀政策，许多经历过文革的人，或心有余悸，或怕惹麻烦，或不抱希望，或持“在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的态度，缄口不言，这样恰恰助长了为文革翻案的极左思潮，给国家和社会留下

巨大隐患，对此切不可掉以轻心。我想，陈小鲁和八中老三届同学会道歉的意义就在于勿忘历史警示世人！

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秘书处 黄坚

2017年2月25日

~~~~~  
【亡灵祭坛】

我的母亲李敬仪

• 吴晓晴 •

我的母亲李敬仪和父亲吴天石都是在“文革”之初南京高校学生——特别是南京师范学院学生——批斗干部教师的疯狂暴行中遇难的，这就是1966年8月3日晚发生在南京的南师八三事件。当时父亲是江苏省教育厅长，但在7月已在《新华日报》上被点名批判，罪名是封建的资本主义教育路线的代表人物，母亲当时是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因为受到父亲问题的牵连，也在南京师范学院受到了批判，大量的大字报在“声讨”所谓“吴李黑线”和“吴李黑帮”，并且捏造出所谓十大罪状。当时，高校学生疯狂的“革命热情”已经被煽动起来，一时间，给“黑帮分子”戴高帽子批斗游街成为各高校学生在“文革”初期采取的最为“革命”的斗争方式，南京师范学院许多疯狂的学生唯恐显示不出其革命的彻底性和斗争的坚决性，在游街批斗我的父亲和母亲时无所不用其极，致使母亲李敬仪当场身亡，父亲吴天石两天后也因抢救无效身亡。

“文革”以后五十多年来，一直都有关于父亲吴天石的各种纪念文章以及书刊发表、出版，从这些珍贵的历史记忆中，使我们对父亲的一生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关于我母亲李敬仪的纪念文章则不多，只是《南京师太报》在1986年的一期专刊上登载了一组回忆文章，主要介绍了母亲在南京师院的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务处、院办和院党委等部门工作的情况和事迹。我们作为子女，对母亲的一生，特别是母亲早年的生活，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等，仍没有了解多少。2000年前后，南通市文联开始实施一项很有意义的文化工程，编辑出版《江海文库》丛书，其中印行有母亲的义父，南通的著名教育家曹文麟的文集《觉未寮文汇》，曹文麟文集中记载了我的外公李苦李和我的母亲李敬仪的一些事情，又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看到了母亲过去写的一些自传材料，因此对母亲的家庭身世、早年生活和参加革命的经历也就有了一些了解。1935年，母亲曾撰文纪念外婆逝世六周年，文末写道：“怡不文，何能传吾母，然惧两弟他日或忘母德，谨就所知者述之，顾亦未由显母之生平于万一也。”这一段文字也可转用来说明我们做子女的就我们所了解的史事撰述母亲简略生平的初衷。

一、母亲的家庭与学习经历

母亲李敬仪生于1912年7月21日。母亲的家庭是一个客居南通的书香世家。母亲的父亲，即我的外公，名李桢，字筱湖，又字晓芙，号苦李，世籍绍兴，其祖、父游幕江西，外公李桢十三岁丧父，因家贫而发愤自学苦读，并精于金石书画，后为吴昌硕高足弟子。1904年，外公应友人之邀，来南通为张謇主持翰墨林书局事，两年后，与江宁张雪琴结婚，遂在南通安家落户。外公家庭人口多，我的母亲李怡（字敬仪），上有一姐李愉，字巽仪，下有两弟，李其通、李其达（李荆），还有两妹。此外，外婆张雪琴有一姑母夏太夫人因无子女，且双目已盲，外公把她接了回家赡养，“事若母”。外公还有一妹嫁贵州廖

家，寡居无所依，也被外公招至南通，并将一女（李）恒（字淑仪）过继给了她，改姓廖。因外公做事的书局薪资微薄，养家糊口已属不易，加之外公交游广阔，因此入不敷出，家境贫寒，要靠外公卖字画补贴家用。

母亲李敬仪十三岁时入南通女师附小高级部读书。不知道母亲此前有没有读过初小，亦或就是在家启蒙、识字、读书的。母亲知道自己读书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不仅是因家境贫寒，还因当时重男轻女的社会习俗对家庭有很大的影响，外婆更喜欢母亲的两个弟弟，母亲说：自己能上学读书，是因为家里想要她带领弟弟读书，因此母亲读书尤为刻苦用功，用优秀的成绩来争取继续求学的机会，后来母亲在自传中写道，她“每次升学的允许都经人向我父亲劝说”。因为家庭经济窘迫，外公在书局的收入根本不敷开支，外婆经常取出一些自己的首饰要母亲拿去银楼变卖了补贴家用，母亲年幼，往往在银楼附近犹豫良久才鼓起勇气走进来，有时母亲哭着对外婆说不想去银楼，但最后为了生活还是不得不去。这段经历在母亲的记忆中特别深刻，后来在她写的一篇纪念外婆的文章中特别提及了此事。

母亲在南通女师附小毕业后，于1927年考入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张謇于1905年创办的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最早的女子学校之一，在江北首开女子教育风气之先。民国建立后，学校于1912年11月改称“南通县立女子师范学校”，1913年8月，张謇在校内附设女红传习所，聘请刺绣大师沈寿主持。南通女师在第一任校长姚蕴素（姚鼐侄曾孙女，范当世夫人）的十多年悉心办理之下，发展为以女子师范为主干，附设附属小学、女红传习所、幼稚园和职工传习所的综合学校，形成了师范本科、预科、实习教授批语会以及高小、初小等完备的教学体系。张謇还为南通女师作《女子师范学校歌》：“……通州女师范，乃在城之东。名园袭珠媚，讲席开春风。”母亲进入女师，得到了这个不易的学习机会，继续认真苦读，她后来在自传中写道，当时“总是想在家庭内做一个好女儿，在校内做一个好学生。”南通女师为母亲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母亲在女师学习期间，家庭遭遇了重大变故，我的外公、外婆在数月之间相继病逝。外公李苦李自四十岁后就一直为疾病所困，时常吐血。1929年，外公因病发到上海去医治，6、7月间竟病逝于上海，年仅五十三岁。报知噩耗的电报传到南通，母亲一家人的惊惶之状不可想像，那时全家有8口人要靠外公薪资生活，外公去世，全家立刻陷于无法生存的局面。后来，靠了外公的朋友设法帮助，在翰墨林书局领取了三年的抚恤金，才暂时维持着全家的生活。

外公去世时，母亲已在南通女师读初二，母亲的大弟也读到了南通中学初中一年级，母亲感到只有用苦读来告慰外婆，于是和姐姐、弟弟互相勉励，共同担负维持家庭的责任。母亲的姐姐李巽仪没有继续读师范，但受外公影响，善绘画，而且在女红传习所跟随沈寿学习刺绣，得其真传，因此就到西亭小学去教图画。哪知李巽仪不幸染上了猩红热，这在当时是烈性传染病，没有什么好办法治疗，只得回到家里，靠着外婆不分白天黑夜的照料、看顾，李巽仪的病竟然好了，但外婆自己却病倒了。母亲见外婆病情严重，身体滚烫，于是把外婆抱倚在自己怀里，想用自己的身体去吸收外婆身上的高热，但外婆最终还是病逝了，此时距外公病逝仅113天。外婆的丧事刚办完，母亲也传染上了猩红热，为了不再传染家人，就睡到了医院里，她幸而挺过了这一难关。经过这场大变故，母亲家里只能靠姐弟四人来维系支撑，日常生活费用要精打细算地节省着用，在学习上，母亲姐弟互相督促，更加用功，母亲在女师的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

1931年母亲十九岁，这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激起了全国范围的抗日救亡运动，救亡浪潮也席卷南通各校。南通女师当时的校长罗玉衡是国民党员，实行的是封建保守的教育，不许学生过问和参与校外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但是女师也卷入了抗日救亡

浪潮。母亲在南通女师已是师二（高中师范科）学生，还是年级级长，并照例担任南通女师的学生自治会主席。女师的学生冲破了校方的限制，走出校门，上街游行，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检查和抵制日货，母亲还作为女师代表参加了南通学生反日会。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母亲说，她“这时才开始产生了爱国思想。”后来，南通学生反日会因内部少数代表有矛盾，南通女师和南通师范的代表先后退出，学校当局也趁此时劝说学生代表退出，回校学习，于是南通学生反日会就此解散了。母亲作为南通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第一次参加了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社会政治活动，这也成为她后来走上抗日、革命道路的起点。

我的父母亲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在1930年代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了九一八事变后国家民族危亡的激励，他们积极加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激发了爱国思想，由爱国而走向革命，成为他们人生的一条必由之路。

二、影响母亲人生的义父曹文麟

母亲上学读书的时候，特别是在女师学习期间，深受外公的挚友、南通著名教育家曹文麟（勋阁）的教诲和影响。曹文麟是南通最早的留日学生之一，具有新思想。他1904年入清华学校，1906年留学日本大学高等师范部，1908年曹文麟回南通省亲，被张謇挽留于家乡，创办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当时他三十岁。进入民国后，曹文麟与我的外公李苦李成为挚友，在诗文、金石、书画方面互为知音。曹文麟膝下无子女，外公将最小的女儿过继给了他，母亲的小妹到曹家后改名为曹中章，曹文麟非常珍爱。1929年，外公李苦李和外婆张雪琴相继过世，母亲姐弟四人面对家庭变故束手无策之时，家中一切后事的办理，甚至购置敛服等事，也全靠曹文麟四处奔波，家庭生计也依靠他的安排照料，母亲因此对曹文麟非常感激。母亲进入南通女师后，经常到曹文麟家中走动，向他请教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问题和文章诗词的作法。曹文麟学识渊博，当时是南通师范的名师，他和顾怡生、顾颉予、徐益修并称南通四才子。曹文麟很喜欢我母亲，辅导我母亲写文章、诗词，母亲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很受教益，旧体诗文都作得很漂亮。同时，因我的外公、外婆过早去世，母亲感觉到在曹文麟那里又重新获得了父爱。

1933年初，母亲的小妹，过继给曹文麟作女儿的曹中章因患肺结核病去世，年仅十七岁，曹文麟非常悲痛，母亲平日就与曹中章关系亲密，对中章的病逝十分悲伤，但母亲却更加感受到曹文麟内心伤女的悲痛，她反而多次去曹家安慰曹文麟。曹文麟一向喜爱母亲李敬仪的孝悌、文雅和聪慧，“自昔爱之甚，目秀眉亦长。摩顶或携手，赏其为智囊”，因此郑重地提出，要母亲也给他做义女，但不改姓名，仍叫李怡（敬仪），母亲立即就答应了，此时是1933年的农历正月初九。曹文麟对我母亲李敬仪欣然答应也作他的义女，“亦竟居膝下，欢笑直若狂”，对我母亲更加关爱。不久，曹文麟还在所作《祭李苦李暨张夫人墓文》中特告知我的外公、外婆以我母亲为义女事：“……公子巽仪从孙君议属怡来侍，而怡亦极念君与我昆弟之好，且复敦古昔君子之谊，决然事我夫妇而一无所疑。我安肯负君夺君爱子，乃显旧氏命之曰李怡，而仍其字为敬仪。……”

1933年7月，母亲在南通女师以全校毕业生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母亲毕业时心情激动，毕业成绩优异，可以告慰自己早逝的父母，也没有辜负义父曹文麟的培育和期许；毕业以后就有了职业，有了收入，终于达到了改变家庭经济窘迫境况的愿望，母亲说，她“对家庭的前途又有了希望”。

在南通女师毕业时，母亲和她的同学们一起办了谢师宴，感谢几年来诸位师长的殷切教诲，曹文麟为此赋诗一首：“自昔桐城有大师，递传罗范式闺仪。门容桃李矜儿辈，珠媚芙蓉忆曩时。世念卜商盈掬泪，我怀伏胜百年思。黄君差似尤公健，见此当增酒一卮。”他还

为义女从女师毕业作诗庆贺：《怡儿毕校业诗以庆之》“半分可让如求阙（儿成绩列第二），甲等非奇已胜常。一纸文书三载绩，賁函记取闰端阳。我借儿才门有耀，儿如我意益舒才。生成尽许天能助，厚福还从识道来。阿中有愿编吾集，杂稿于今付托儿。门外断无晁错简，中郎黄绢不题辞。”曹文麟把自己的文稿托付给了我的母亲，希望由她来完成女儿中章编辑父亲文集的遗愿。

从曹文麟的诗文中还可以看到，母亲作为曹文麟义女，特别是从女师毕业之后，生活中充满了温馨的亲情和乐趣。《怡儿游宁苏沪杭以诗为别》记叙了母亲游历南京、苏州、上海和杭州之事，这应当是在母亲毕业之际，否则不会有此闲暇，母亲去江南游历，义父曹文麟专门赋诗作别，为我母亲的这次游历描绘出绮丽的画面，诗中曰：“大江本属幼时路，今日方亲江与湖。湖有文章山有画，为弘神智辟天郭。钟山久护上京安，沪渎仍夸域外观。休问齐云楼畔迹，绮罗灰尽暮烟寒。……”

曹文麟的《游山杂诗》记叙了母亲陪同义父曹文麟登临狼山游览的情形，诗中曰：“……娇儿细意具春蔬，我款嘉宾心更愉。顿为阿中神一失，山亭华雨未模糊。（怡儿以时已晏为具午饭。阿中之初读于家，曾与摄影山半茅亭大石前，时有山雨，阿中执桃花而立。）登山有杖或言痛，儿数殷殷为我虞。自喜而今腰脚健，还当放鹤问西湖。（登山时，怡儿屡问能行否。自去年春与儿有游湖之约。）……商量像石置云窝，陂仄庭虚古意多。我欲岁携儿拜谒，南山涧畔北山阿。（苇一谓个窠将置苦李像石于茅亭后。）儿随兄弟抠衣去，掠鬓风多塔数层。云脚四瞻天意绿，江流黄影不掀腾。（儿与巽仪、其达登塔。）……”

《元宵携怡儿狼山观烧》则记叙了1935年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时，曹文麟携我母亲，以及母亲的姐姐李巽仪，母亲的同学陆志专、尤其娟等至狼山观赏灯火民俗的事，诗中对元宵夜景色作了生动的描绘，“……野烧一时举，乡俗传先农。上自佛之塔，下至僧之宫。俯纳陇间火，照入千百瞳。……儿方邀诸姊，远视落日红。谓是画境界，水波？碎红。又见万顷田，方卦烟迷蒙。及远若成雾，为农驱蠹虫。于时冥色至，奇观振我慵。揽衣并登塔，薄寒迎天风。火点倏渐起，旋已为深丛。圆月在天半，色澹浮于空。万星竞摇动，似与波相泛。儿辈惊所见，诗画难形容。……”

母亲在传统文化方面因受义父曹文麟的教诲与指点，在女师就有才女之称，但母亲留下的旧体诗词不多，有几首看来可能是她那次游历江南时的作品：

《晓起》“西园古名胜，晓色扑双眉。露重蝉鸣涩，云消月落迟。荷香霏静气，燕影掠轻漪。曲径幽如许，徘徊清我思。”

《忆江南》（三首）“归梦断，凉月欲沉西。古柏窗前如鬼立，老泉屋角学儿啼。此景最凄迷。（初至无锡宿古文昌阁下，中夜梦醒，闻泉声有作）风景地，难忘北山湾。雨外春江流一线，烟中远岫斗双鬟。渔唱画图间。（春雨如丝，旧游似梦，孤馆兀坐，不觉神往烟霭间也）挥手去，客路短长亭。残月一钩星数点，马头宿酒未曾醒。回首旧山青。（别李雨萍）

后来，母亲在1962年夏游览宜兴善卷洞，又写了《游善卷洞四绝句》：

群山拱护径幽深，砥柱当门笑迎人。白象青狮呼欲出，洞天寥廓四时春。
悬岩滴乳神工，石磴盘旋峭壁通。怪道寒梅千古在，只缘根在雾云中。
飞瀑双悬溅断崖，奔流壑底震风雷。还如月黑闻金鼓，万马腾骧列阵来。

船行壑底声全寂，灯映巉崖影亦寒。历尽三湾方叹绝，豁然喜见碧天宽。

四首绝句纯为写景，白象、青狮、风雷、金鼓等都是善卷洞中的景点，全部诗句完全没有那种假大空的政治口号词语，可见母亲在中国古典诗词上的颇深造诣。但“文革”时这四首绝句被荒谬地批判为是向党进攻的号角，是杀气腾腾地列阵向党进攻。

母亲从女师毕业后被南通教育局派做女子职业学校代理校长。南通女师这一届毕业生中只有成绩最为优秀的两人被派去做校长，安排了较好的职位，母亲因此非常珍惜这份工作。这所女子职业学校是一个为年长失学的女子补习文化和学习技能的学校，也是南通女师附设的女子职业教育机构，在校学生有七八十人，有教师四人，母亲的姐姐李巽仪这时也已到这所学校教绘画、刺绣。姨妈李巽仪后来在南通就职于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她在刺绣和绘画上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母亲在书画篆刻方面也很有天赋，我们还保存着一个母亲画的扇面，画的是荷花，扇面右上方题有一首小诗：“平池碧玉秋波莹，绿云拥护青摇柄；水宫仙子斗红妆，轻步凌波踏明镜。李怡”南通女子职校学生除了读书学算外，主要是学习刺绣和缝纫。后来，我在老家看到一些刺绣作品，有花鸟画绣品，也有吴昌硕书法的绣品等，绣工精美，问了姨妈，才知道这是当年女子职校学生的习作。

女子职校在南通教育界虽然并不受重视，但对南通地区女子职业教育的推动和发展仍起了一定的作用。母亲到女子职校工作，充满了热情，一心要把职校办理好，又因为职校的工作实际并不太繁忙，刚刚走出校门的母亲求知欲特别旺盛，她订阅了《生活周刊》，对邹韬奋等人在杂志上发表的进步言论相当崇拜，感到他们抨击国民党政府专制腐败政治和压制抗日救亡运动的言论切中时弊，是正义、正当的。在不知不觉中，母亲不断地接受着新的思想。

母亲在女子职校工作期间，义父曹文麟几乎每天都来职校，看望我母亲，和她谈论诗词文章。母亲主持女子职校中遇到大事，也都要向义父请教，从曹文麟《怡儿书来谓方计虑所主职业校之展览会甚惧其过劳也》一诗可见，母亲为展示女子职校的办学成绩，曾举办了女子职校展览会，母亲对筹备展览会的事非常重视，惟恐会有考虑不周的地方，因此写了信给曹文麟。曹文麟当时不在南通，故作诗回复：“有智频当繁剧任，正须静气自安神。分工递进寻常事，百辈凭依总揽人。舟车千里失归期，熟晤云山又忆儿。母倘招儿相审顾，为防烦郁更防疲。”对我母亲的工作和身体都非常关心。

为了使我母亲不忘自己的家世，1933年4月的一天，曹文麟专门询问我母亲是否知道我外婆的家世，母亲告诉义父，家里藏有生母张雪琴的父亲张廷英（虎臣）的一些资料，主要是手抄的各种档案文书，母亲自己也曾看过，知道自己的外公张廷英幼时遭战乱，家人都遇难了，于是张廷英投身淮军，征战有年，积功而为军官。第二天，母亲把这些资料带来，曹文麟“披览有顷，亦为悚神，戚戚者久之”，感慨之余，即利用这些史料动笔写了一篇《清游击銜尽先补用都司兼袭云骑尉世职张公虎臣传》。据此小传，我对母亲的家世也有了了解。

1935年冬，因十一月初七日外婆张雪琴五十生忌，也是逝世六周年之时，母亲和姐姐李巽仪挈两个弟弟设置了祭筵怀念外婆，母亲的义父曹文麟也来了，他还写了一篇长诗，以我母亲姊弟数人皆已自立成才告慰其老友李苦李的夫人，长诗开头几句是：“暖日燠庭户，和气盈高堂。云何见和气，诸儿蕴以扬。阿愉善绘乡，阿怡富文章。阿通督工肆，阿达居州庠。复有阿恒勤，朝朝临机坊。以次俱成立，俛令家门昌。漫漫夜已往，大地无繁霜。灿灿光上腾，东方升朝阳。……”事后，母亲也为外婆逝世六周年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登载在《通通日报》：

◇ 先母事略

先母氏张，讳雪琴，江浦游击衔补用都司袭云骑尉虎臣公次女也。年二十一，以从母夫项公之介归先父，婚于江宁。父时就通州书局事，因随寓于通。舅氏早世，外王母夏太夫人独居，后且病盲，乃迎养。母生子凡九，今存者大姊愉、小妹恒、弟其通其达及怡耳。先父应友人之招，自赣至，所入微，母既归，必自奉至约用乃敷，以多子故，益劳瘁。父寄情金石书画，又好宾客，家事悉母任之。诸子渐长，适廖氏姑复以既寡无所依迎归，用益不给。父性清介，虽辅以书画所得酬，犹无济。母惧烦苦，常令怡鬻饰物以益，不以告父，并不令家人闻人。怡时尚幼，羞之，袖饰物至银楼左右，逡巡数四乃敢入，心怦怦然惧为人见。后乃辞不往，然母一温抚，辄不忍拂母命。今思之，乃知母心苦也。母得男子子迟，笃爱通弟，而训之则严，每日自校返，令从师习文，晚间令怡与弟温所习，偶怠，即峻责。故儿辈畏父严并畏母严也。后父咯血，有时哮喘，甚厌器，母旦夕维护，而愈不敢以家事告，乃更苦。己巳夏，父就医上海，六月二十二日得疾革讯，母携愉姊达弟往，则已不及晤语，此后母乃愈为家计虑、为儿辈悲矣。是年八月，姊任西亭小学教师，怡送姊登舟返，见母泣于堂，家人皆因之泣。十月初，姊罹猩红热归，母为理汤药，姊稍愈而母病，迄十六之夕，疾大殆。怡以母热极，苦烦甚，登床，倚母于怀而分其热。母旋呼曰，儿父来矣！有顷，不复能言，遂逝。距父丧方百十一日耳。呜呼，儿今者继为曹氏子，复得慈母之爱，而犹恨不获常与病母相依倚频呼母问母所苦也。痛哉，痛哉！母以清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初七日生，年四十有四。今年乙亥，母若在者年五十矣，追维往昔，凄怆无已。虽母逝后之三年，怡毕师范校业，后五年，通弟毕纺织校业，皆稍稍勉任职务；达弟方肄业初中，恒妹亦入纺织厂司事，姊与怡同从役女子职业学校；今年秋，姊已归于黄氏。凡此皆母逝时未及豫知，偶一念及，亦为之惊且喜。然于母之生忌，宁能不念母若尚在顾儿辈之献寿欣喜为何如耶？怡不文，何能传吾母，然惧两弟他日或忘母德，谨就所知者述之，顾亦未由显母之生平于万一也。（原载1935年12月18日《通通日报》）

三、母亲与父亲的相随相伴

1934年，由南通的著名教育家和学者顾怡生先生介绍，母亲和父亲吴天石相识。母亲后来说，她走上革命道路，深受父亲的影响。父亲在南通师范读书时就是顾怡生和曹文麟的得意门生，他和几位同学还有南通“小四才子”之称。父亲在南通师范毕业后，因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浓厚兴趣，听从顾怡生先生建议，考入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2年，父亲从无锡国专毕业，回南通任崇英女中的国文教员，但教书仅一个多月，即因发行和传阅左翼文艺刊物等被南通国民党县党部以共产党嫌疑罪名逮捕入狱。后因家里使了钱，又因共嫌证据不足，父亲被关押八十多天后获释，但江苏省教育厅不准许他再在江苏本省教书，于是他由刚刚结识的朋友李俊民介绍赴山东教书。李俊民是在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后来失去了和党的联系，他是顾怡生先生的表侄，顾怡生之子顾民元和我的父亲吴天石也是挚友，顾民元很早就已入党，后也因环境关系失去了和党的联系。父亲交游广阔，待人诚恳，以致南通还有“交友莫若吴天石”之说，他的朋友中大都是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因此他也从中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父亲在山东济南、文登、聊城等多地教过书，在每个学校教学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影响却很大，他的许多学生后来纷纷都走上了抗日革命的道路。父亲在外地求学、教书期间，经常有书信向顾怡生、曹文麟老师问安、请教，或希望老师有诗文相赠。如曹文麟1934年的一篇《若宁字说》即记述：“甲戌十月，吴子天石自聊城寄书，冀以文赠。余就其名，复为字曰：若宁。取《尔雅·释言》‘若，顺也’，将为之字说，先以告。……”凡是假期回到南通，父亲都要去拜见顾怡生、曹文麟等老师。母亲成为曹文麟义女，父亲也就认识了这位早已闻名的才女，并对她十分仰慕。

母亲和父亲相识后，她思想上的进步得到了更多的帮助。父亲介绍了很多新书刊给母亲看，有译文、时事类编、妇女生活等杂志，有《静静的顿河》《第四十一》《被开垦的处女地》等翻译的苏联文学作品，母亲对阅读苏联翻译书籍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她还通过对鲁迅作品的阅读，对现实社会的不平有了一定的认识，从而，母亲的思想更加解放，眼界也更为开阔，她开始注意国家大事，关心时事政治，虽然对如何改造社会并没有深刻的认识，但如她所说，也已“展开了对革命美丽的幻想”。

母亲在结识父亲的第二年（1935年）就订了婚。1936年农历三月，母亲李敬仪和父亲吴天石结婚，他们租赁掌印巷徐宅王氏屋安了家。这一年，父亲参与了顾民元、江上青、江树峰等编辑出版《写作与阅读》杂志的筹划。年底以后，因时局变化，父亲没有再去山东，后来他也做了《写作与阅读》的撰稿人和编委。母亲因为父亲的关系，结识了父亲的许多朋友，同时阅读了更多的进步书刊。这一年年底，西安事变发生，母亲一方面对蒋介石被扣西安感到高兴，这是不满于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华采取退让妥协政策的反映，另一方面母亲又觉得蒋介石如果被杀害，中国马上又要陷于战乱。这一认识其实也是当时许多知识青年的想法，可以说是基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的考虑。母亲当时的思想认识我感到非常真实，这也使我进一步认为，日本侵华和中国的抗战是我母亲和父亲的人生道路发生转折的关键。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开始走向全民族抗战。母亲很兴奋，每天都去看发布的抗战战事号外，关注着战局的发展，沉浸在慷慨激昂的情绪之中，参加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当上海失守，南通也被日机轰炸之时，南通城内已惶惶不安，人们纷纷下乡躲避，母亲这时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于是和家人一起避难于西亭。两个月后，日寇尚未攻占南通，南通城区各学校复课，母亲因为代理女子职校校长，责任所在，又回城复课主持职校工作，那时职校的学生已寥寥无几，只是母亲一个人维持校务，天天都在担心战局变化。南通沦陷前数日，国民党政府专员葛覃召集南通城区各校校长开会，还在说时局无大变化，要求大家安心上课，承诺如有变化政府一定要通知的。谁知几天以后，1938年3月17日，日寇占领了南通城，国民党政府的专署根本就没有通知各学校，自己就先逃了。南通沦陷之际，母亲和家人再度下乡逃难，避居于南通乡间四安区一带的陈酒店镇超妙乡（草庙乡）。

父亲则在抗战爆发后就在南通当地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主动地接受党的领导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坚持做抗战教育工作。南通沦陷后，父亲和顾民元、马一行、李俊民、史白等人参加了南通特务总队抗敌学校的工作，借此学校作掩护，培养抗日青年做部队的宣传员、指导员。同时，顾民元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党组织随即成立了中共江北特委，吴佐成、唐守愚、陈伟达、洪泽等先后来到南通开辟工作，吴佐成、陈伟达等也参加了特务总队的工作。

母亲的小弟弟李其达（李荆）在1938年江北特委刚到南通开辟工作时就参加了特委的工作，是南通抗战初期的党员，这时他也加入了特务总队，不久就参加新四军，并到了皖南军部新四军教导总队，后来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又回到苏北。特务总队和抗敌学校在1938年10月被国民党顽固派缴了械。父亲和同学吴沫初等人就到金沙镇去为李俊民主编的抗战报纸《新通报》编辑撰稿，宣传抗日，父亲还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去时任马塘区区长叶胥朝处做助手，并做了三个月的超妙乡乡长，开展群众工作。叶胥朝是大革命失败后与党失去联系的党员，抗战爆发后又与党接上了关系，他也是我的母亲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1940年初，已迁到上海的南通女师又迁到如东的丰利镇复课，并聘请父亲去任高中语文老师，于是父亲就应聘去了丰利教书。这时，母亲在陈酒店镇的家已成了党的秘密工作同志往来经过的歇足之处，母亲也接触了唐守愚等一些党的地下工作同志，知道他们都是共产党人，是从事抗战工作的，对他们都抱有好感，关心和照料他们的饮食起居，不怕麻烦。

避居陈酒店镇期间，由于我的祖母和我的大姑妈（我父亲的姐姐，为了照顾我的祖母，一生未出嫁。）早已返回了南通城家中，母亲为了离在外奔波于抗战工作的父亲近些，一直居住在陈酒店镇，共有近三年时间。刚到乡间时母亲没有工作，于是就应当地群众的要求，负责教了原农村小学的二十几个小学生，使乡间的小学生不至于因战争环境而辍学。其实，这也是抗战教育必须的工作，而且，母亲在乡间教书也能有些收入维持家庭生活。几个月后，1938年春夏之际，母亲又有了第二个孩子，即我的姐姐，于是，除了教学生，母亲整天还要被家务事忙得手脚不停，缝衣、烧饭、带孩子都要自己来做。但是母亲在陈酒店镇乡间仍然看到了很多新书刊，如《西行漫记》《中国的新生》《华北前线》等，这些书刊都是父亲带回来的，母亲由此对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袖和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都有了新的认识，她对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和共产党人的英雄事迹非常崇拜，觉得他们非常伟大。

1940年10月苏北黄桥战役结束，新四军抗日铁流东进（南）通、如（皋）、海（门）、启（东），苏北抗战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四军要来了的消息传到了陈酒店镇乡间，母亲听到这消息感到很振奋，惊异于那些书刊上所说的中共传奇人物真的将来到眼前了。但是，母亲居住的陈酒店镇毕竟消息闭塞，这时候与父亲的联系也隔绝了。年底，国民党江苏省第六游击纵队司令徐承德背弃和新四军团结抗日的诺言而叛变，被新四军打垮，母亲家中却遭到了溃退下来的败兵的抢劫，许多衣物都被抢走了，因此觉得陈酒店镇已不能安住。虽然母亲听说父亲已在如皋县政府任秘书，但不能证实，还是不大相信，直到有一天父亲回到陈酒店镇家中，母亲才知道了黄桥战役后南通一带出现的抗战新局面和抗日民主新政权建立的情形，知道了父亲参加接收了在北兴桥的旧南通县政府并任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以及又到了马塘任如皋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的情形。

这时，母亲的两个大点的孩子已送回南通城家里交由祖母带，身边只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于是就离开陈酒店镇，随父亲去了马塘。母亲第一次在马塘的街上看到了传说中的新四军，他们背的枪上挂着红布条，精神面貌和过去的军队完全不同，看到了党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如皋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完全不同于旧衙门官吏的作风，母亲感到耳目一新，心里非常兴奋。

母亲的家是安置在马塘乡间的。1941年的2月，因带在身边的第三个孩子患惊风症夭折，母亲很悲哀，为此写了几首悼亡诗，其中第三首《儿殇之次日，即夤夜避乡》：“避兵夤夜又谋迁，遁迹扁舟亦自怜。转幸儿能安息早，流亡锋镝已经年。”诗中可见，马塘一带虽然为游击根据地，但仍是不安定的。小孩夭折，母亲却少了孩子的牵累，不再被繁琐的家务事缠身，于是在县长叶胥朝的介绍下，母亲就此参加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在县政府秘书室担任编审，也就是做资料整理等工作。正是从这时开始，母亲正式参加了抗战与革命工作，其动机和原因很多，但母亲对父亲的挚爱和受到父亲的影响、母亲一直在追随着父亲所走的路，显然是主要的。

四、母亲在抗战、革命的道路上

虽然母亲参加革命是诸多因素的影响，但亲身参加了党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亲眼看到和接触到工作同志的艰苦廉洁作风，欣喜地阅读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党的抗战政治理论书籍，还阅读到大量有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书刊，母亲的思想认识，特别是对抗战中复杂的政治时局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1941年初，皖南事变已经发生，母亲参加了如皋县政府举行的皖南事变遇难同志追悼会。母亲对国民党在寇深祸急的抗战艰难时刻背盟反共深为痛恨，对于皖南事变中党和新四军损失了大量优秀干部深为痛惜，

母亲的小弟弟李荆皖南事变时就在军部教导总队，是否突围或遇难，当时生死不明，没有消息，母亲非常牵挂，幸而小舅舅李荆后来历尽艰辛突围到了苏北。但是在抗战之后的1946年11月，已为山东野战军一纵二旅五团参谋长的小舅舅在鲁南战役泥沟战斗中牺牲。

1941年夏，父亲参加了苏中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又到许楼办文教研究会，接着，奉调去筹办江海公学任副校长。母亲因为正在生病，也随父亲到许楼休息。8月里，日伪大举扫荡，马塘、掘港相继沦陷，江海公学一时办不起来，母亲和父亲就在许楼“埋伏”。这时，如皋县政府已北迁到丰利附近，父亲仍去县政府任秘书，母亲便也到了丰利附近。年底，经丰利战斗后丰利失陷，根据地各级政府都精兵简政，缩小规模，在当地坚持，新四军一师师部这时也在如皋一带活动，母亲“亲眼看到师首长们艰苦坚持的精神，很受感动”。当时斗争环境紧张，丰利失陷前后，如皋县政府的几个女同志时常要预先疏散或紧急疏散到周围的老百姓家里，非常不便。由于新四军一师这时已命如皋县政府随师部行动，县政府即再行精简，县政府党团会议决定母亲等几位女工作人员、干部家属都各找关系作掩护，“埋伏”起来。母亲因为一直是做教员的，要“埋伏”还只能以教员的职业作掩护，她在乡间也没有“关系”，很难“埋伏”，加之母亲过些时候还要生孩子，再因父亲抗战前一直在山东教书，抗战爆发后也不在南通城，而是长期在如皋一带做抗战工作，南通城里熟悉父亲、知道我父母关系的人不多，于是母亲决定回南通城里“埋伏”。

1942年2月初，母亲回到了南通城。那时，南通城里汉奸徐宇春维持会派的势力很大，伪南通县长薛郢生、教育局长袁少初等都是徐的势力。当时，父亲有一个表兄刘润香，政治上无任何背景，抗战以来因为要解决生活问题，就任了伪职，在南通做伪教育局的科长。母亲回城后，刘润香对母亲说起，离我祖母家数十步远的跃龙桥小学要找一名能教六年级的代课教员，他劝母亲去做，母亲考虑后就答应了下来。因为日伪在南通城里正要重编保甲，没有职业的人很难找到联保，特别是母亲回城后看到家庭经济状况不好，孩子的衣服、零用都要想办法解决，祖母还要母亲以后就在家带孩子，不要再下乡了，催促母亲答应去代课，母亲为了应付祖母，马上就去了跃龙桥小学代课。

沦陷时期的南通城里，教育界普遍呈麻木的现象。袁少初甚至主张学校要读经，刘润香也主张学生死读书，小学校长李菊生，是父亲的南通师范同学，留在南通城里主要是为了谋生养家。跃龙桥小学教职员十一人中女教师有九人，平时她们讲究装饰打扮，闲时打牌赌博，母亲和她们很合不来，因此心情苦闷，只盼着生了孩子后可以赶快离开南通城，返回根据地。

1943年3月末，父亲托人带信要母亲离城下乡去了一次，商量母亲是不是能离开南通城回根据地的事，母亲因为又添了个孩子，感到带在身边很不方便，而且这时有确切消息，日伪又将开始清乡，如皋县政府还要向北转移，恰巧这时遇到了苏中四分区保安秘书处，他告诉我父母亲，日伪的“清乡”马上就要开始，要母亲赶快回去，再“埋伏”一个时期，于是母亲又回了南通城。4月，日伪的“清乡”开始了，连南通城里形势也变了，原来的维持会势力都下了台，伪教育局也换了人，刘润香的科长也做不成了，日伪的特工队在城里肆意敲诈勒索，到处抓人，日伪的反动宣传也更为嚣张，母亲感到很难继续在南通据点里“埋伏”下去，于是决定不再等待，就设法找关系带信给父亲，要求赶快下乡，返回根据地。恰巧父亲已在掘港直镇托了与如皋县政府有关系的文具商人冷先生进城来接我母亲，6月，母亲带了3个孩子跟随冷先生到了直镇丁陈乡。

父亲这时任根据地的如皋中学校长兼文教科长，母亲就在学校附近住了下来，并被组织上安排在如皋中学教初中一、二年级学生的国文。如皋中学是1942年底根据苏中会议的精神，如皋县政府创办的敌后随军作战性质的学校，也是一所准干部学校，主要培养抗战中

前线和后方所需的人才，学校以丁陈乡九条巷欧阳洲家为基地，并无固定的校舍，当时日伪“扫荡”“清乡”频繁，学校就采取“敌来我去，敌去我回”的游击方式与敌伪周旋。虽然游击方式教学很艰苦，但母亲感到生活在根据地里精神上痛快极了，离开根据地一年多时间，再回到根据地，感到根据地面貌又是焕然一新，根据地的一切建设都取得了好成绩，一年多前在根据地已经开展的减租减息、民兵建设等都表现出了显著的成效，而且母亲的工作又是她的教师本行，胜任愉快，教学之余，母亲贪婪地阅读着党的各种书籍报刊，了解时事政治，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更加感到不能落伍。在如皋中学，苏中四分区地委宣传部长夏征农来学校作报告，讲了读书的方法，指出读书是要认识真理，而真理是在大多数人，劳苦大众和被压迫的阶级的一方面的；苏中区党委组织部长周季方在文教研究会上讲了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指出知识分子只有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革命才是正确的道路。这些报告和讲话对母亲的启发很大，母亲的政治觉悟提高了，她说：自己由此转变了过去为读书而读书的错误看法，认识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和出路。

1944年春，日伪又开始了对苏中根据地的“扩展清乡”，苏中四分区的一些后方机关及学校开始向封锁线以外转移，如皋中学一大批决定北撤的师生员工转移到了苏中二分区所属东台县的鲁灶庙，在那里与东台中学、邱陞中学、栢茶中学等各校合并，组建了“苏中二分区联合中学”，简称“二联中”（1944年11月，苏中根据地区域调整，东台县划归四分区，“二联中”改称“苏中四分区联合中学”，简称四联中），二联中以南通教育界知名人士、教育家顾颉予任校长。顾颉予先生也是我父母亲的老师，因此母亲在二联中教书心情舒畅。

母亲随如皋中学北撤之时，父亲的工作又有变动，他随夏征农等赴宝应参加创办新四军苏中公学，苏中公学是新四军一师的干部学校，其前身是抗大九分校。1944年3月，新四军发起了车桥战役，攻克车桥、泾口、曹甸等日伪据点，解放了淮安、宝应以东纵横二百里的地区，打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根据地的战略联系，使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根据地联成一片，巩固和扩大了苏中根据地，打乱了日伪“清乡”计划，实现了苏中形势根本转变，同时为苏中的干部和部队开展整风运动提供了安定的环境，苏中公学的创办，在当时主要是集中军队和地方的基层干部进行整风。

母亲在二联中工作的时期，是她参加抗战、参加革命工作后第一次独立工作，因此把它当作了锻炼自己的好机会。在随如皋中学北撤前，母亲就请人把第二个孩子（我的姐姐）送回了南通，交由我祖母照料，这样，母亲在工作上就少了些累赘，能够更加勤奋地一心扑在教学上。在二联中时，母亲的住处离学校较远，又有两个孩子在身边需要照料，虽然是供给制，但生活上许多问题如领米、领草等解决起来也很困难。这时，父亲在苏中公学经常有信带给母亲，并且问母亲是否愿意到苏中公学去工作。对于去不去苏中公学的问题，母亲有些犹豫。东台鲁灶庙靠近海边，很偏僻，但这里和南通城毕竟离得不远，经常可以得到家乡的消息，而且母亲不想失去在二联中这一独立工作的锻炼机会，对在二联中的工作，母亲感觉各方面都很好，特别是经过在南通据点一年多的“埋伏”，母亲“感到自己落伍太多”，“深切感到能力不够，思想上有求进步的渴望”，所以母亲“在工作上自动地钻研”，力求在二联中给大家留下好印象。但是，父亲在苏中公学，母亲又担心父亲的身体，也希望自己到了苏公或能把父亲的生活安排得好一些。母亲还考虑到，苏公是部队生活，艰苦却更能锻炼人，但是自己长期做文教工作，到了苏公有没有适合自己去做的工作呢？这时，父亲已派了人来接母亲，于是在9月里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位于宝应曹甸镇固晋一带的苏中公学，加入到了新四军火热的部队生活大熔炉中。可喜的是，小舅舅李荆也在苏中公学工作，任队列科长，负责军事训练和警卫等工作，母亲和小舅舅姐弟俩又在苏公重逢。母亲认为：决定到苏中公学去，是把自己“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母亲来到了苏中公学，被分配在宣教科工作，主要是整理材料，由此开始了新鲜的部队生活。苏中公学正在进行整风，母亲感到苏公处处充满着学习的空气，更加激发起学习的热情，于是向组织上提出了参加在职干部整风学习的要求。在苏中公学参加整风，是母亲第一次系统地接受革命理论的教育，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思想政治觉悟。在和同志们一起工作、学习的过程中，母亲被同志们对待新同志的诚意帮助、诚恳批评的态度所感动。在整风学习的打通思想阶段以前，母亲认为自己到苏中公学还有着在这里作客的心理，经过打通思想的学习，认识到了自己思想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要自觉地参加到革命事业里去，不能逗留在外面，要把革命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

母亲在整风中系统整理了自己的历史，撰写了详细的自传，总结了在整风中的具体收获：清算了自己的主观主义，去除了自甘菲薄的思想，能够正确地估计自己；对党有了进一步认识，认识到了自己只有和革命结合在一起才有前途，不然就会被淘汰；认识了整风治病救人的精神。党对干部的爱护与教育，使母亲深受感动。经过整风学习，母亲向组织上提出了入党申请，1945年2月，由鲍汉青（当时的苏中公学宣教科长）、宋庭铭介绍，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候补期三个月，1945年7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为了适应战后新形势发展的需要，苏中区党委决定在苏中一分区成立苏中公学分校，教育和培训从南线投奔根据地和新四军的知识青年。苏公分校的学员成份包括三分区干部学校的学员、四分区专科学校的学员、新招收的进步知识青年、根据“双十协定”从苏浙军区北撤的一部分地方干部。11月，苏中公学分校在海安县丁家所镇成立，父亲任校长兼党委书记，母亲也随之调到苏公分校，做教务工作和校刊工作。1946年7月，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苏中解放区，苏中战役后，苏公分校北撤，10月改为江海公学，直属苏中区党委领导，江海公学又采取了抗战时期的游击教学方式，母亲在江海公学仍做教务、校刊工作，还担任了支部书记、出版股长。1947年，江海公学开展了模范运动，母亲因工作认真负责，当选为模范工作者。

1947年11月，人民解放战争发展到新阶段，因前方、后方以及开辟新区都需要大量干部，于是江海公学在大丰、滨海地区改为华中公学，主要教育和培训区乡干部，学员最多时达到3600余人。母亲在华中公学仍做校刊主编。1948年5月，国民党军黄伯韬兵团向苏北“追剿”，遵照华中工委的决定，华中公学2300多人进行了艰苦的千里长途行军，北撤到山东解放区莒南县十字路镇曲流河，争取到了一个较稳定的学习环境。母亲在北撤山东的行军中还要照顾10岁和6岁的两个孩子，但她经受了锻炼。1948年10月，华中工委决定在华中公学的基础上成立华中大学，父亲任副教务长，母亲也调到了设在盐城的华中大学，仍做图书资料工作。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全国即将解放，苏南区党委决定在原华中大学基础上建立苏南公学，父亲先后任副校长、校长，母亲在苏南公学任图书资料室长、校刊社长，不久，苏南公学由无锡迁到常熟，母亲任教务科长。1952年8月，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和苏南行署教育处批准，成立了苏南师范学院筹委会，江苏建省后，1952年12月1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批准，改名为江苏师范学院，父亲为首任院长。母亲于1952年9月即调到江苏师范学院，任宣教科长，这时即从长期从事的干部教育工作岗位转到了普通高等教育工作岗位，并兼任了江苏师院政治专修科的副主任。

五、母亲在南京师范学院

1954年1月，父亲调任为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党组书记，母亲于同年2月调南京师范学院工作，任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不久改任院长办公室主任。1956年，母亲任南

师院党委副书记。同年4月，在江苏省高等学校和科研机关干部会议上，母亲受到省委文教部的表扬，先进事迹是“任《中国革命史》课教学好”，“工作一贯积极负责”等。母亲在江苏师院工作时就承担了《中国革命史》课程的教学任务，到南京师范学院工作后，仍然长期讲授《中国革命史》课。母亲和父亲一样，从本质上说是一名教师，热爱教师职业，热爱教学工作，她在《中国革命史》课的教学上下了很多功夫，因为日常行政工作繁忙，常常要在晚上备课，夏夜，只能躲在蚊帐里写讲稿。后来母亲和父亲合作，以石友李的笔名编撰了中国革命史通俗读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故事》，因为这本书中有百团大战等内容，“文革”初期这就成了为彭德怀树碑立传的“罪状”。

1957年，反右运动开展。母亲作为学校党委副书记，应该也是学校反右领导小组的成员，但“她确为有的干部、教师说过一些客观、公正的话。为此，在文革中被加以包庇右派的罪名”。（注1）当时，“马列主义教研室有的同志说了一些在当时看来是越轨的话，她没有为当时的‘左倾’情绪所左右，搞无限上纲，随意定性，而是实事求是，对干部作全面的历史的分析，由于她和当时马列室的负责同志的正确掌握，我校政治教师中没有划一个‘右派’，从政治上保护了党的干部。”（注2）7月12日省委文教部的通报认为：“从各校对右派分子的排队情况看，标准宽严掌握不一，因此右派分子的比例各校相差很大，如南京师范学院的右派分子仅占全校教职员学生总数的0.6%，而南京航空学院则达7.5%，两校相差达12.5倍。”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组织上对母亲曾有“党内斗争锻炼较差”，“沉着、肯干，但政治水平不够高，适宜于做教务行政工作”的评价。1957年10月，省委同意文教部的建议，母亲不再任党委副书记，改任教务处长。1960年4月，母亲当选为出席江苏省文教群英会的先进工作者，在南京师院的群英会代表登记表上，评价母亲“平时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平时思想修养较好，在处内外威信较高，深得同志们爱戴”，可见，母亲在南京师院教务处主持学校教学工作成绩显著。大约1960年代初，母亲再次担任南京师院党委副书记，一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母亲在南京师院工作了十三年，其间学校领导层人员多有变动，而母亲则是校领导中在校工作时间最长的，这也导致在“文革”之初学生批判学校领导时，把所有“罪责”都加到了母亲身上。

“文革”之初，为什么母亲在南京师院受到荒谬、残酷的批斗殴打，为什么1966年8月3日晚“疯狂”的学生在批斗我父母时残酷斗争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南京其他高校学生对领导和教师的批斗，以致母亲在被游街批斗当中殒命？母亲受到父亲问题的牵连是一重要原因。父亲在1966年7月就受到江苏省《新华日报》的点名批判，主要罪状是父亲写的《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一书，特别是书中的一段文字是关于海瑞的，这在当时更是大逆不道。由于父亲是省教育厅长，又被批判为江苏省封建的资本主义教育路线的代表人物，母亲也就成了这条所谓“黑线”上的人物，成了在南京师院忠实执行这一“反动”教育路线的当权派。母亲不仅在师院领导层中受到批判，一次次作检查，而且激进学生的大字报也都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我母亲。

另一原因当与南京师院和师院学生有关。“文革”初期的一个普遍现象，即无论哪个城市，在当地成为“文革”主力，有很大影响力和号召力的，都是当地的最高学府。南京师院在各方面比不上南京大学。但南师学生来自农村的多，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的多，在讲究阶级路线的年代，这些学生带有的农民革命的各种特征都非常明显。之所以过去从土改直到“四清”等主要在农村开展的政治运动中都发生“左”的错误，当与农民的阶级特性有关。而且，南师学生还想以激烈的斗争方式使自己在“影响”上能超越南大，一争南京高校学生领袖的地位。因此，八月初南京各高校，特别是南师周边的南京大学和华东水利学院，都早于南师发生了批斗领导干部和教授专家的过火斗争，但各校的“左”都比不上南师学生制造的“八三事件”！

母亲在被游街、批斗当中是怎样身亡的？当时只能将其原因归结为天气异常炎热，父母身上被淋满墨汁，堵塞了毛孔，母亲原来就有心脏病，因此经受不住游街批斗等。后来，我们就只能说母亲身亡是因为天气炎热和患有心脏病，这是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和压力使然。

“文革”结束后，江苏也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江苏负责这项工作的是老省长惠浴宇，他在回忆录中记叙了我父母在八三事件中遭受残酷批斗身亡时的伤情，惠老能调阅档案，他的记载是准确的。我在此文中不再复述惠老写的情况，仅辑录我们得到的南京师范学院组织部档案中关于我父母身亡，特别是母亲身亡的资料，用以复原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况。

（一）

南京师范学院组织部 省公安厅关于“八三”事件的专报、驻南师工作队的情况报告、“八三”事件的现场照片、吴天石同志的病情报告以及李敬仪同志的尸体鉴定

自1966年8月3日起至1966年8月9日止

（66）办02849

江苏省公安厅关于文化大革命保卫工作情况专报（三十一）（略，见本刊zk1301c）

（二）

南京师范学院组织部 关于“八三事件”专案调查组的简报、汇报提纲、调查报告

自1978年7月起至1979年2月止

编号：10（机密）

关于“八三事件”专案调查情况简报之一（略，见本刊zk1301c）

调查八三事件的档案材料反映：母亲被疯狂的学生拖架着游街，他（她）们揪住母亲的衣领拖拽，边拖边打，母亲“走不多久，无力支持，被几个学生拖着，上衣领勒到颈部，拖到西康路时，窒息死亡”（引自另一份档案材料）。当时的尸检报告也说明了这一点。很明显，母亲是被那些疯狂的学生拖拽着游街，殴打，直接勒死的！父亲则被打成双臂骨折，双腿拖成瘫痪，脑水肿，八月五日身亡。因此，1978年5月30日，老省长惠浴宇在我父母母亲的骨灰安放仪式上致的悼词中当场加上了八个字，“悲惨遭遇，人间少有”！我看过“文革”中许多被迫害致死的人平反昭雪时的悼词，还没有看到一例悼词中有类似的言词！

母亲在“文革”之初被迫害致死时年仅五十四岁，她的一生短暂、平凡。母亲是接受了传统文化教育，又汲取了新文化养分的知识女性，如果不是恰逢抗日战争，母亲可能会一直从事女子职业教育，也可能去做一个中小学语文教师。母亲是在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但她并没有直接参加过武装斗争或地下斗争，而是一直在根据地和解放区从事普通的抗战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她才长期担任高等院校的教务处长、党委副书记等领导职务。母亲对待任何工作都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从不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母亲养育了我们六个子女，即便经历“文革”，我们几个子女也都学业有成，事业有成，这与母亲对我们的言传身教有很大关系。母亲在“文革”之初被残酷批斗而惨死街头，原因之一是母亲只承认是所谓反动教育路线在南京师院的代理人，除此之外决不承认其它任何强加给自己的罪名，决不违心自污，并以沉默和一言不发的方式作抗争，宁折不弯，因为母亲和父亲同样极为看重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格和气节！

母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注1 冯世昌：干部的楷模 教师的知音—深切怀念李敬仪同志 《南京师大报》1986年9月11日

注2 刘德华：学习李敬仪同志的优秀品质和作风 《南京师大报》1986年9月11日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